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的言论写作研究

NINGMINGERSIBUMOERSHENG
HUSHIDEYANLUNXIEZUOYANJIU

汤景泰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汤景泰◎著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的言论写作研究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的言论写作研究 / 汤景泰著.
—成都:巴蜀书社,2010.5
ISBN 978-7-80752-565-3

I. ①宁… II. ②汤… III. ①胡适(1891~1962)—
议论文—写作—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206 号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的言论写作研究

汤景泰 著

责任编辑	张玉亮 王梦珂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028)85011398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0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565-3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一)

朱文华

听说汤景泰博士的学位论文即将出版，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所以，他向我索序，我也就答应了。

自2000年秋季起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在为每届学生所开设的课程中，均有“中国近现代作家研究（胡适研究）”的选修课，因为在我看来，对当代青年学生（尤其是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阅读、认识胡适的作品并进而理解胡适的思想具有多重意义。虽说各届学生都对该课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学得很认真，而且作为考试的课程论文也都写得不错，但在选择毕业（学位）论文的课题时，却往往更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另一一些作家作品（虽然我对此是表示尊重并支持的），唯有于2008年夏季毕业的汤景泰同学，敢于确定以胡适的作品和思想为研究对象，尽管他知道，这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的难度明显地超过其他课题。所以，当年在他和我最终讨论确定这一论文选题时，他对这一选题的学术意义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表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听他表示有信心写好论文时，我也就放心了，相信以他平时的刻苦学习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以及已有的学术训练和前期的学术准备（如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和对相关学术背景资料的熟悉与掌握程度），是完全能够写出一篇扎实且多有新意的学位论文的。果然，他的论文不仅顺利通过“盲

审”，而且在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的几位专家（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于这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又一致予以充分肯定和较高的评价，由此所判的分数（平均）在 90 以上（属“优秀”等级）。令人高兴的是，又正是凭这样一篇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论文，汤景泰博士随即向我校的新闻学院申请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也就顺利获得批准——目前他正在进一步研究新闻学的有关课题。

现在，为写本序文，我把汤景泰博士的这篇学位论文重读了一遍。说到该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我认为至少可以简要地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论文的研究课题所涉及的具体对象内容，突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单一的学科领域，明显地触及了“新闻学—中国现代新闻史”学科的相关课题，而且，整篇论文又是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来做观照，所以不仅论文的学术视野是开阔的，而且以其触及的具体学术课题的跨学科性（或者说文学与新闻的两大学科的有机结合），也具有明显的深度与广度。这样的研究课题的确定以及完成，应该说是具有创新特色的，由此还带有某种程度的方法论的意义，至少对于文学专业或新闻专业的学生（研究生）来说，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学术启示。

第二，从“胡适研究”专题学科的学术背景看，该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关于胡适的报刊编辑活动、胡适的新闻报刊编辑思想及其特点、胡适的言论写作观、胡适言论的文章学的特点特色等），乃是近几十年来的胡适研究的专家们多少有所忽视的，至少

是未作深入的专题研究的^①。例如，胡适一生经营（或创办、主编，或参与编辑，或任主要撰稿人）的报刊，从“五四”之前的《竞业旬报》、《中国留美学生季报》，到“五四”以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国学季刊》、《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再到1949年以后在台湾编辑出版的《自由中国》等，均为中国近现代新闻（报刊）史上的具有多重价值的报刊，而胡适发表在这些报刊上的言论，作为充分体现了胡适基本的和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思想的有代表性的论著，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也产生过各种重大的影响。汤景泰博士的这篇论文的主体内容，正是通过对胡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经营几份最重要的报刊期间的思想活动与言论以及相关问题的深入考察，相当客观而准确地评述了作为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报人”兼思想家的胡适的人格形象和思想风貌。唯其如此，整篇论文可谓别一形态的胡适传记，与学术界已出版的多部胡适传记相比较，无论研究内容的着重点还是研究问题的视角和切入点，都有自己的新的特点，所以也就具有了某种创新性。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该论文是胡适研究领域的一个虽说不大但却较扎实的因而也是值得珍视的一个新成果。

第三，该论文特别关注“言论写作”的问题，即把“言论写作”视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研究的专门课题，这是很有见地的。据我所知，以往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论著，很少有从“言论写作”的角度切入的；而新闻学界的学者，似乎也大多是过于重视新闻史上的“言论”本身，而对与“言论写作”有密切联系的相关问题则有所忽视。现在，汤景泰博士的论文发表了，新的研究视角揭示出来了，相信可以对

^① 应该承认，著名的胡适研究专家、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先生曾著有《胡适政论与近代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不过该书主要是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胡适的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的内容观点的评析，来考察胡适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的演变，进而探讨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潮等。汤景泰的博士论文明确地把沈著列入“参考文献”，表明他对沈著的研究成果是尊重的，并多少有所吸收。但两者的立论角度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而这正是汤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研究新闻学相关问题的朋友们有一定的启发。

末了顺便说，因为讲到“言论写作”，不妨借此机会，接过汤的话头再罗嗦一下。该论文的“摘要”中说——

“胡适的言论写作的特点在于，其主旨始终指向民主宪政与教育科学两个方面没变。而且为求得其主张更有效的传播，他落脚于中国的现实问题，从不空谈主义，以容忍的态度对待反对意见，坚持‘立言无所苟’的独立精神，实践了一种理性、平实的言论风格。在言论写作过程中，胡适明知坚持这样的主旨与风格会被孤立、被打击、被污蔑，但他仍融合儒释道三家精神的真旨，实践了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宣言。”

在我看来，胡适思想是不是“融合儒释道三家精神的真旨”的问题暂且不去说它，但论文所揭示的为胡适所坚持的那种“立言无所苟”的独立精神，的确值得肯定与弘扬。众所周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媒体遵循的是所谓“舆论一律”，在这样的情况下，“言论写作”的问题当然不值得探讨，事实上也难以探讨。但由此所产生的相应的社会政治局面及其直接的和间接的恶果，实在是太可怕了。痛定思痛，我们现在既然承认“百家争鸣”的必要性乃至合法性，又强调“政治文明”的建设，那么理应以平常心来看待任何形态的言论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温一下胡适曾经明确表述（也是切实践行过）的关于“言论写作”的根本的立场与态度：

“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①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

① 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初刊天津《大公报》（1947年8月24日），转摘自耿云志编：《胡适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第135页。

平的滥调。”^①

“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自由。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态度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又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②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言，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自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苟且’的政论。”^③

“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的勇气。”^④

“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总算不曾说过一句自己不深信的话：只有这两点可以减少我良心上的惭愧。”^⑤

在以上的几段话里，关键词无疑是“负责任”——其主要内涵是：言论当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对作者本人负责。联想到笔者自身，说来惭愧，几十年来也曾发表过几百篇大大小小的文章，但扪心自问，实在不敢说自己完全“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

①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初刊《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七期（1955年4月）。

② 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是为胡适于1929年为筹办中的报刊《中论》预写的发刊词，原为未刊手稿，转引自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45页。

③ 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初刊《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1933年4月16日）。

④ 胡适：《致吴世昌》（1935年11月22日），转摘自耿云志编：《胡适语萃》第199页。

⑤ 《胡适文存一序例》，原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引自黄山书社1996年版《胡适文存》第一集，第1页。

不曾说过一句自己不深信的话”。这一点，我曾在给包括汤景泰在内的学生们上课时承认过，希望学生们引以为戒。当时曾有学生似是安慰我说：其实现在国内的文化人（包括某些所谓的“学界泰斗”和“国学大师”），有谁能够真正做到像胡适那样呢？但我表示，这种情况也不能成为原谅自己和放纵自己的理由。现在我把自己说过的这样的话形诸文字，除了再作自我反省外，当然也希望引起其他朋友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至少，我要对汤景泰博士说：我辈乃是过渡时代的人物，而你们一辈作为新时代的学人，无论如何应该成为勇敢的践行“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而其最低限度显然是：即使在不能完全说真话的场合，也决不说假话和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违心的话。

2009年8月10日

序（二）

刘海贵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我国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一句名言。说起它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范仲淹直言敢谏，却也因此屡遭放逐。有这么一次，他又因“言”获罪，惹恼了皇帝，被贬谪到了远离京城的饶州。饶州地处偏僻，范仲淹辗转奔波，到那里不久，妻子李氏就病逝了，他自己也罹患重疾。其时，诗友梅尧臣恰好也在附近做官。得知故友情形后，梅尧臣就作了首《灵乌赋》给他，苦口婆心地告诫这位总爱说话的仁兄，别再像那报凶的乌鸦，总是呀呀多鸣，招人厌烦。他劝范仲淹还是学会栓紧舌头，闭住嘴巴，这才是应该的生存之道。读毕此赋后，范仲淹亦作《灵乌赋》应答梅尧臣，斩钉截铁地表示，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会闭口不“言”。不管人们有多么讨厌乌鸦的叫声，他都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好一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人类的自由大词典上，这句誓言一般的内心表白，和美国人亨利那句“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宣言意义相近，却又比后者早了七百多年。而从另一角度，如果我们把针对现实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问题“发言”，视为知识分子角色构成的本质特征之一的話，那么，范仲淹一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谓把“言”之于知识分子精神构成的重要性体现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在此意义上，范仲淹此语实是传统中国士大夫视“言”为命、以“言”

立身的集体表达。大概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范仲淹取得了共鸣，所以胡适极为推崇这句话，并专门写过一篇时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并多次将这八个大字写成条幅送给友人，用以勉人，亦以之自勉。

当然，从“传统/现代”的视角来看，标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古代名臣范仲淹与将这八个大字奉为至理名言的现代知识者胡适，纵然他们在以“言”立身的精神追求上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无论是“言说”的主旨、内容，还是其所凭借的途径与媒介，二者皆有了传统/现代的截然区分，再不可同日而语了。其余勿论，单就其“鸣”据以传播的媒介言，随着现代新闻传播业的兴起，报刊杂志成为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发表政治、思想、文化见解的基本渠道。在这些现代传播媒介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学者们可以著书立说，更可以针对各种现实问题自由发言。对于千年前单单凭靠坊刻、朝堂“谏诤”或清议发表一己之言的传统士大夫而言，这种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是他们难以想象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通过报纸、杂志而“发言”的政治、思想与文化实践，就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思想史、文学史乃至传播史上的新课题。景泰的研究思路正是从这里展开的。开篇伊始，他便明言，“言论写作是近代以来依托于报刊形成的一种新型写作方式”，在近现代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面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围绕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充分发挥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优势，产生了以王韬、郑观应、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章士钊等为代表的一批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报刊作家”，在其报刊言论写作过程中，这些作家逐渐探索、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报刊文体，形成了一种言论写作的新传统”。由此可见，作者所注目的，正是刚刚我们所说，近代以来才逐渐发生、发展起来的一种知识分子“言说”新现象——这也即是作者所谓的“言论写作”。如前所述，这一极具现代意味的知识分子言论传播活动是一个横跨思想史、文学史与新闻史的新现象，亦是一个需要众学者广泛关注、集体力行的课题。本书作者着眼于此展开自己的论述，自然显

示了本书的价值。

以上是从宏观的层面论，而就具体研究对象来看，作者最终选择胡适这样一位文化巨人的言论活动为论题，这无论是对近代以来便已成型的言论写作考察而言，还是就近年来渐成“显学”的胡适研究来说，都是极其典型而富有创新意义的。作为一个“继往开来的启蒙大师”，胡适一生秉承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启蒙主义论政述学，且大有“虽九死而不悔”的姿态。无论在文学界、史学界，还是在新闻界、教育界与政治界，他都功绩卓著，影响深远。特别是在新闻领域，从青少年起，胡适就通过《竞业旬报》的编辑和报刊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除却该报，他一生主编或参与创办的报刊先后有中国留美学生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以及《自由中国》等数种，在现代新闻传播史上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地位。至于言论文章的写作，胡适则无论是和“报章文”、“时务文”、“逻辑文”等“新文体”的开创者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章士钊等前人作比，还是和与其一同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朋辈相较，他都是用力最勤、坚持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位。因此，本书从言论写作这一角度来研究胡适在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文化实践的演变、主旨与特征，又从新闻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视角梳理并探究胡适言论写作的特征、主题、风格与价值，显示出相当的创新性，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新闻史相关领域和胡适研究领域的拓展。

本书的一大特点还在于作者勾稽史实的功夫。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人，曾经享有“中国第一流的哲学家、新闻记者称号”的胡适一生主办或参与的报刊活动极多，其所发表的言论文章就更是恒河沙数，难以胜数。作为一部以“胡适的言论写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对于胡适各个时期报刊文化活动与报章文的系统整理、勾稽爬梳就成了作者必须要做的第一要务。在这一点上，作者显然下了比较大的功夫。正如我们在阅读本书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无论是对近代以来“新文体”源流的历史回溯，还是对贯穿胡适一生的报业活动及其

报刊文章的系统钩沉，作者都无不力求客观、准确、周详，亦无处不在“史实”的描述中，再现着胡适不同时期言论写作的精神特点。这种“史”“论”结合、钩稽爬梳的功夫，希望景泰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坚持发扬。

当然，金无足赤，本书也难以避免有些缺憾。首先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对于“言论写作”这一关键术语，作者的具体界定似乎尚嫌简略了些；他以“史实”再现见长，却在一些地方忽略了“论”；在文学史、新闻史、思想史多维视角的融汇中，作者显示了自己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功力，但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仍需继续摸索。但瑕不掩瑜，这仍是一部具有创新价值的专著。希望大家从阅读中得到某些启发，也希望本书所提出的问题能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的兴趣。

是为序。

2009年8月6日

引 言

言论写作是依托于报刊形成的一种新型写作方式。近代以来，在亡国灭种危机的逼迫之下，如何迅速有效地传播现代思想，以启蒙民众复兴中华，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因其发行迅捷、保存便利等特点而把文字的作用，无论是在空间意义上还是在时间意义上，都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成为解决这一时代课题的首选。凭借报刊的种种传播优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针对转型时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的新问题，发表自己的批评、见解与主张，在中国思想舆论界掀起阵阵波澜，并产生了报章文、时务文、新民体、逻辑文等流行一时的文体，形成了言论写作的传统。

一 我国近代的言论写作传统

言论写作的起源植根于近代报刊的发展。早在 19 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就在南洋、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随着各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外报在中国发展更为迅速。1860 年，“外国教会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 32 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

倍”^①。这时候外报规模也更大。如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香港新闻》，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丛谈》、《中外杂志》、《上海新报》、《教会新报》、《益闻录》、《万国公报》、《申报》，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等，都产生了持久且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报纸不仅需要面向大众传播全面、及时、准确、通俗易懂的各类信息，同时还要就大家共同关心的各类问题发表自己的评述，这就为文体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中国古典散文虽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体多样，产生的经典名篇灿若群星，却并不能提供一个适用的报刊文体。虽然当时欧美国家的报刊文体早已成熟，而且中国那批现代意义上最早的报刊主编也多是外国传教士，但面对阅读趣味和习惯完全由中国古典文学培养起来的中国读者，这些主编固然可以借鉴本国成熟的经验，同时也不能不作些变通，努力从中国古典文学里吸收营养，探索一种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的行文方式。

最初，这种探索因为是由外国传教士和少数科举不得志的文人为主导，所以文体的演变极其缓慢。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报刊进入迅猛发展期。报刊上除了新闻消息、通讯之外，分析评论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经济问题的“论说”逐渐多了起来。这时候以王韬为代表的几位文学素养较高、受过西学训练的先觉之士投入到“论说”的写作之中，鼓吹变革、倡导维新，使得这种议论性的报章文体开始独具特色，“报章文”的说法渐渐流行开来，从而形成了言论写作的第一次高峰。

王韬（1828—1897），字仲弢，号紫铨，别号弢园老人、天南遁叟、蘅华馆主，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角直镇）人。1845年，王韬以当地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第二年，他跟随父亲赴南京应乡试，结果名落孙山。至此以后，王韬便放弃科举。20岁那年，王韬赴上海探望在那里设馆授徒的父亲，立刻被那里散发的现代气息吸引。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9。

1849年父亲去世后，他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司的聘请，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从事著译工作。1857年，又参加了《六合丛报》的编辑工作。但在1862年，他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为其出谋划策被发现，遭到清廷通缉，于是改名王韬。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王韬到了香港，并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年冬，王韬获得了出国游历的机会。在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地的过程中，他眼界大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了解更为深入。1870年回到香港后，他与友人黄平甫集资购得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成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他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政论。正是因此，王韬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1884年，在清政府的默许之下，王韬终于又回到了上海，并于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

王韬在《循环日报》时期的政论就主题来看，主要集中在变法维新方面。其中既有为变法图强而鼓吹的纯理论性文章，如《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又有为具体的洋务运动献计献策的文章，如《洋务》上下两篇，以及《设领事》、《达民情》、《停捐纳》、《练水师》、《设电线》等。在这些文章中，王韬敢于痛陈时弊，大胆揭露各种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在《停捐纳》一文中，他开篇就指出：“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几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而更复减价折值以广招徕，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搢绅矣。其用资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垣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但得与上游相识，或有世交旧谊，立可得优差，或分派之厘税各厂，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厂事简而人众，不过上游以此为调剂而已。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但在厂当差数年，而捐纳之资早已

全偿；及其挨班得缺，取盈于民，尚忍言哉？”^①在当时那样一个风气未开的时代，像王韬这样能够公开把捐纳之弊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的，实属凤毛麟角。

在风格上，王韬报章文的一大特色是敢于突破所谓的“桐城义法”的束缚，体现出自己的真性情。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王韬说：“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往往下笔不能自休；若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②基于这种有意识地追求，王韬的政论读起来，让人感觉立意鲜明，论述流畅，文字简洁，稍有古文功底即可读懂。

除此之外，王韬的一部分报章文为了加强报刊的宣传鼓动效果，还借鉴了中国古代纵横家们的言论风格。例如在《变法》一文中比较中西差距的时候，王韬写到：“呜呼！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倭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③文中层层推进的排比句，大大加强了论述的气势和力量。

除王韬之外，当时在报章文写作上较有特色的还有何启、胡礼垣、郑观应等人。何启（1858—1914），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胡礼垣（1847—1916），字荣懋，号翼南，晚号逍遥游客。原籍

①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M].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73.

②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M].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1.

③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M].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22-23.